

追求教科书式的博物馆学研究之道

——梁吉生先生访谈录

Pursuing Museology Research with the Textbook-Style Approach:
Interview with Mr. Liang Jisheng

受访嘉宾：梁吉生¹ 访谈者：闫广宇²

Interviewee: Liang Jisheng¹ Interviewer: Yan Guangyu²

(1. 南开大学, 天津, 300071; 2. 科学出版社, 北京, 100717)

(1.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2. Science Press, Beijing, 100717)

内容提要：作为中国较早涉猎博物馆学领域的一代学人，梁吉生先生以追求教科书式的博物馆学研究为使命，致力于高校博物馆学专业创设、博物馆学研究，尤其是博物馆史研究等，为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

关键词：博物馆学人物 博物馆学教育 博物馆史研究

Abstract: As one of the early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museology in China, Mr. Liang Jisheng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useums by pursuing museology research with the textbook-style approach, creating museology major in the university and researching museology, especially museum history.

Key Words: Museum scholar; museology education; museum history research

梁吉生，教授，1939年出生，1959年秋考入南开大学历史学系，1964年毕业并留校任教。曾参与筹备南开大学历史学系博物馆学专业，主讲“博物馆学概论”，任博物馆学专业副主任。1982年，先生作为高校文博教育者代表，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

国博物馆学会^①成立大会，并当选中国博物馆学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1981年7月，国家文物局^②在承德避暑山庄举办博物馆学研讨会，先生作为高校博物馆学专家代表与会，参与探讨今后的中国博物馆建设问题，参与编写《博物馆学概论》一书。1983年

① 2010年更名为中国博物馆协会。

② 因该单位名称在不同时期有所更改，为行文方便，统一使用该名称。

中国加入国际博物馆协会后，先生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在伦敦召开的国际博物馆协会第十三届大会。曾任天津市文物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博物馆学委员会委员等。先后发表一系列有影响的博物馆学论著。

一、南开大学博物馆学专业筹设

□ 您作为国内较早涉猎博物馆学的领军式的一代学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参与筹备南开大学博物馆学专业，为博物馆学专业进入大学教育体系作出了贡献。请谈谈具体筹备情况。

南开大学博物馆学专业创办于1980年，至今已有四十多个年头。当时，南开大学为满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充分发挥综合性大学的学科优势，主动调整已有学科设置体系、积极创办新学科专业，尤其是文科专业结构，在加强基础学科的同时，积极发展应用学科。在此期间，南开大学新增了10个文科学系，即法学系、管理学系、社会学系、金融学系、旅游学系、政治学系、图书馆学系、东方艺术系、会计学系、国际经济系。博物馆学专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筹办的。

南开大学博物馆学专业为什么设在历史学系，这里有一段历史渊源。1958年，历史学教育“大跃进”，南开大学历史学系下设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史三个教研室，同时还设有一些专门化研究方向，比如党史专门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门化等。在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的积极倡议下，南开大学历史学系曾开设了博物馆学专门化班，而且请到王冶秋等前来讲课。但该专门化班于1962年停办了。1980年，在启动新学科建设时，历史学系很自然地就提出了博物馆学专业筹设。

20世纪80年代，整个南开大学充满着多元、开放的激情，师生的精神面貌非常饱满，对筹办博物馆学专业特别热心。但有两个难题摆在面前，就是提供哪些课程，配备何种专业教师。专业是高等学校学业的门类，其构成主要包括专业的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和专业人员。

课程体系是社会职业需要与学科知识体系相结合的产物，筹办一个专业首先就要构建合理的课程体系。最初参加博物馆学专业设计的老师都是历史学出身，包括中国古代史教授王玉哲、傅同钦、傅玫等同仁和我，王玉哲先生任教研室主任。对于博物馆学课程体系，我们并不是很通达，因此决定先进行全国性的调研。调研的第一站是北京，在王玉哲先生的带领下，我们首先来到国家文物局，同相关领导座谈，并虚心请教。国家文物局领导指出，国家迫切需要高校建立博物馆学专业，为文博事业发展提供专门性人才，并对文博人才提出提高业务素质能力的要求。之后我们前往北京大学、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向张政烺、王振铎等先生求教。主要请教了三个问题：博物馆包含哪些业务工作、不同部门的工作人员应具备哪些专业知识和技能、博物馆人员知识和技能的来源有哪些。此后，傅同钦、傅玫和我又前往河南安阳、郑州，山西太原、大同，陕西西安等地的博物馆展开调研，以了解人才的需求状况和培养规格。

通过以上调研，在思想上我们统一了两点认识。第一，专业课程设计要涵盖科学性和技术性。所谓科学性，就是博物馆基础知识；所谓技术性，就是博物馆应用技能。文博专业是应用学科，这点当时我们是清楚的。第二，学科和专业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专业是在一定学科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不能离开学科科学知识体系，而应根据学科发展规律设计专业。在以上专业设置思想的指导下，我们确定了博物馆学的公共课程、专业课程、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技能操作等内容，初步构建起博物馆学专业课程体系，并且大体上确立了课程讲授的量化目标。

其次，筹办一个专业需要组建专业教师队伍。专业教师队伍是通过内部调剂和外部招聘两个渠道组建起来的。最初只有四位，王玉哲先生身兼数职，主要是统筹领导，傅同钦、傅玫是中国古代史专业过来的，我是从中国近现代史专业过来的。后来，王玉哲先生的博士生朱凤瀚先生毕业以后，也加入了。校外从天津市历史博物馆招聘了刘岱良和马子庄老师，同

时从吉林省文物考古方面招聘了张锡瑛老师。这样涵盖科学性和技术性的教师队伍初成建制。

经过艰辛的筹备，南开大学博物馆学专业架子搭好了。最后，也是极为重要的一项——生源。首届学生并非专门招收，而是从历史学系中国史专业调整来的。历史学系通过说明文博专业设置的方向、人才培养的目标、就业去向等事项，请1980年入学的中国史专业新生自愿报名，经教研室审定之后，决定学生名单。

南开大学博物馆学专业的创办卓有成效，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现已成长为中国文博事业建设的领军人物，如安来顺、黄春雨、杜晓帆、陆建松等。继南开大学之后，浙江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也陆续开设了博物馆学专业。

□ 您从事博物馆学专业教学多年，对这一职业有深刻感受，您认为高校博物馆学专业教师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专业素养？

从我个人的教学经验来看，高校博物馆学专业教师应该具备的素养概括起来有二十个字：文博专长、人文素养、国际视野、中国情怀、复合类型。也就是说，高校博物馆学教师应该具有良好人文科学素养和系统扎实的文物博物馆知识，具备较强的实际操作能力、文化交际能力和适应不同工作的能力。

具体来说，大概有以下五个方面。首先，坚定的政治方向。其次，扎实、广博的专业知识。再次，活跃的理论思维和较高的理论修养。博物馆学是以明确的对象、范畴和目的，逐步推进的原创性学理化、学科化的研究阐释，是以本国文化为基础，再造博物馆文化多样性和建设性的知识体系。因此博物馆学研究者 and 教师具备活跃的理论思维和较高的理论修养十分重要。高水平的理论修养，包括文理方面的，就是良好的人文科学素养和系统、扎实的文物博物馆知识。然后，较强的教学活动组织能力。博物馆学专业的教师，不仅要支持、指导学生实际操作，而且要带领学生走上社会，参加专业实习工作，因而应该具备一定的社会交际能力、

指导学生实习的组织能力。最后，开阔的知识视野、深入的理论辨析能力和持续的创新力。从这些年与学生接触的经验看，理论思辨能力强的学生走上社会以后，能够快速适应社会环境，捕捉国际学术动向，有针对性地采取应对国家博物馆发展变迁的措施，很快就在学术上崭露头角。学生如此，教师更不用说。

我特别强调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创新能力表现在各个方面，不仅在教学上要有开阔的视野和适应工作的能力，而且在科研上要有创新性的学术视野。适应能力，是指不但具备文博专长、人文素养，还要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特长，能够在文博行业和国际交流等方面适应不同工作的能力。

□ 四十年前，您参与筹办博物馆学专业，从事博物馆学教育，而时下出现博物馆热，有关博物馆教育的讨论不断。博物馆学教育和博物馆教育一字之差，您是如何理解它们的，二者有何区别，又有何联系？

要回答博物馆学教育和博物馆教育的区别和联系，首先要明确博物馆和博物馆学不是一个概念，并在不同概念的背景下，辨析博物馆教育和博物馆学教育的差别。博物馆是以物为基础的文化设施，因而博物馆教育是以博物馆为基础而开展的教育实践。博物馆学是研究博物馆运作过程的学问，是以博物馆现象为研究对象的一种理论化的、学科性的知识门类，因而博物馆学教育是以学科为基础的学科体系的教育，属于学科属性的课程体系领域。

博物馆既是博物馆教育的特定情境，更是博物馆学所关注的特定情境。博物馆学教育更加强调理论思维，而博物馆教育强调实践性和应用性。博物馆学教育是以博物馆学学科为架构的一般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主要讲授学科理论、学科发展的过程和内在逻辑，同时要对社会现实和相应思潮（包括理论思潮、学术思潮、社会发展思潮等）的最新进展有比较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实现理论之间的内在融通。博物馆教育包括博物馆的具体知识和专业

工作的要求,以及跳出专业知识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谱系,也即博物馆内部工作人员所谓的继续教育,是博物馆内部工作人员的知识结构、技术结构的一种再教育、再深化、再提高,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公众教育。

所以这两者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种区别首先体现在它们不是同一个概念,而这种不同的概念又规定了不同的教育范围、教育宗旨和教育方法。

二、博物馆史研究,开风气之先

□ 研究博物馆史、加强博物馆学理论建设,一直是您做博物馆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您曾撰写了大量关于中国博物馆学的文章,尤其是对中国博物馆史的梳理,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请您谈一下国内博物馆史的研究状况,以及您对博物馆史研究的认识。

中国博物馆史研究非常重要,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于了解中国博物馆的过去、当下和未来走向非常重要,是博物馆学入门的一个重要渠道。第二,研究中国博物馆史是在世界博物馆史研究领域取得中国博物馆地位和话语权的一个重要契机和起点。我们近年来能够被国际博物馆界包括国际博物馆协会比较详细、全面的理解,是跟我们对中国博物馆史及中国博物馆现状的介绍有很大关系的。1983年,中国加入国际博物馆协会,我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去英国伦敦参加国际博物馆协会第十三届大会,在与包括陈国宁女士在内的台湾地区的博物馆学人,苏联的博物馆代表团成员,日本代表团的中川成夫、鹤田总一郎联系时,发现他们也都是从博物馆史谈起的。我作为国际博协会刊《博物馆》(*Journal of Museum*)特约亚非撰稿人之一,撰写的《博物馆培训在中国》(*Museum Training in China*)一文,对大陆博物馆培训作了鸟瞰式论述,也是以博物馆史作为开端的。1984年,我受邀到荷兰莱顿大学讲学(后因经费问题未能成行)的讲稿,也是从博物馆史着手的。

人类活动的轨迹,都会构成史的内涵。国有国史,市有市史,村还有村史,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历史。博物馆也不例外,也有着丰富的史的记录。

20世纪80年代,我刚刚跻身博物馆学专业,从事的就是博物馆史研究。南开大学博物馆学专业成立后,我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进修了一年。当时博物馆的负责人是王宏钧先生,由他来安排我到各个部门去考察、学习。我们曾经有过一次长谈,他希望我在这次博物馆研修工作结束之后能够写一个总结。我当时想到两个主题: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近代博物馆、中国近代博物馆史沿革。他比较倾向后者。我曾就这个主题跟傅振伦、王振铎、苏东海等先生深入交谈。他们强调了两点:一是学界没有对中国博物馆史特别是近代中国博物馆史进行过比较认真、深入的梳理和研究。受苏联博物馆学的影响,对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都总结得不够。二是要补先人之不足。1936年费畊雨、费鸿年编《博物馆学概论》^[1]和1957年傅振伦著《博物馆学概论》^[2]对博物馆史的叙述多语焉不详。第一点使我在20世纪80年代着手中国博物馆史研究时首先是追本溯源,探知中国博物馆是怎么走过来的,它的缘起和发展过程是怎样的。第二点让我下定决心研究中国博物馆史。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能收集到大量来自国际和国内的资料,包括国际博物馆资料、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博物馆学目录、中国革命博物馆的一些会刊、中国自然博物馆协会和地质博物馆等单位的资料。那时候我几乎每个礼拜都去北京,走遍了北京大大小小的博物馆,拿到不少内部资料。并经常去国家文物局,跟彭卿云等先生坐一坐,聊一聊。

陈国宁女士评价我写的中国博物馆史研究文章有三点。第一,得益于受过历史学训练,比较全面地把握了中国博物馆的走向——它的缘起、发生、发展、历程。第二,在研究博物馆史的过程中比较注重理性思维。所谓理性思维,就是把博物馆发展史与社会发展和需求结合起来。这点非常重要。博物馆绝对不是无缘无故地突然出现,它是听从社会的呼唤产生的。为什么1905年有了南通博物苑的建

立,为什么1925年有了故宫博物院的开放?都是有其深刻历史渊源的。当下中国博物馆发展进入了一个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这也是当前中国社会的呼唤与需求。第三,在研究博物馆史的过程中比较注重博物馆发展与博物馆思想发展的关系。也就是注重博物馆发展与博物馆学的相适应。博物馆学是针对博物馆现象的一种理论总结。虽然过去我们没有这种学术自觉意识,没有想到博物馆的发展与博物馆学有什么关系,但它是一种思想的反映,我当时比较朦胧地注意到了。值得一提的是,苏东海先生的博物馆学自觉意识比较强。徐玲把中国博物馆的发展和走向与博物馆学的理性思维密切结合起来,在理论上对中国博物馆发展做了一个回答^[3]。

中国博物馆史研究主要是为探索中国近代以来博物馆的发生、发展和流变过程,致力于纵向观察和纵向开掘博物馆现象的价值取向。这对了解博物馆发展的社会动因和内在规律,从中获得有益的历史借鉴是必要的。对于中国博物馆史的重视,并引起学人的研究,我觉得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博物馆史研究有了新的发展,呈现五个特点。第一,博物馆史研究的学术自觉意识进一步增强,涌现出一批专著和文章,像宋伯胤的《博物馆人丛语:宋伯胤博物馆学论著选》^[4]、吕济民的《中国博物馆史论》^[5]、苏东海的《博物馆演变史纲》^[6]等。第二,博物馆史的多样化受到重视。不仅有了通史性的论述,而且有地区史、专门史、个体馆史、博物馆人物史等,陆续出现了一批成果。我认为中国博物馆史的研究应该多元化,现在仍是线性的而非发散性的研究,特别是对人物史的研究还不够。第三,博物馆史成为高校博物馆学通论课的内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术现象。博物馆史进入博物馆学通论课非常重要,这给予了中国博物馆史一个学术地位,相当于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国博物馆史应该注意吸收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成果,包括框架、论述、对前沿的思考。第四,博物馆史研究进入国家课题的层面,比如张文立的《中国博物馆学发展史研究》、徐玲的《中国博物馆史研究(1949—1966)》,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术动向。

第五,博物馆史研究体现了博物馆学理论思维的适用。比较突出的是湖南省博物馆原馆长陈建明主编的“中国博物馆学历史文献选编”^[7]丛书和徐玲的论文《中国博物馆学学科发展的回顾与反思》^[3]。以上著述均达到一定的学术高度,不是对中国博物馆史发展现象的简单描述,而是从理性思维的高度来检阅中国博物馆学的发展历程,是对中国博物馆学发展历程规律性的认知和诠释。

在此,要特别说明一点,博物馆史研究和博物馆学史研究是两个概念,二者有不同的研究对象。博物馆学史要研究如何研究博物馆学,它比博物馆史研究更高一个层次,相当于中国的史学史。我认为对中国博物馆史的研究起步早,改革开放初期已经崭露头角,21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入整合期。从博物馆史的研究来说,描述性是它的特征。21世纪开始到现在是理性思维阶段。这是以徐玲等为代表的。从目前来看,中国博物馆史研究还有三个有待改善的地方:第一,中国博物馆史还没有专门化史论,学术资源缺乏系统全面的整合;第二,博物馆史的研究还是碎片化的,没有形成一个博物馆学史的范式,仍然处于初步研究阶段;第三,对于中国博物馆代表人物的研究还不够,而且还处于一种个人简介式阶段研究。我早年给《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8]写过人物词条,那个是简介式的。我在2005年出版的《南通博物苑百年苑庆纪念文集》上发表了《中国博物馆的骄傲——关于张謇及其博物苑的随想》^[9]一文,开始从博物馆学角度来分析南通博物苑的发生、发展、特点、地域文化,以及张謇所表现出来的博物馆学的设想。这样就把人物纳入了博物馆学的思维之中,但现在我觉得做得还不够。

三、活跃在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之间

□ 改革开放后,中国博物馆的发展进入新阶段,您在这一时期主持或参与了许多重要的博物馆理论与实践活动。请简要回顾和总结一下这一时期您有关中国博物馆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情况。

学术是时代的产物,每个时代都会有学术的特定追求,每个时代的学术都应反映所处时代的特征。大言不惭地说,我是改革开放初期第一个追求教科书式的博物馆学人。我的学术经历可以揭示出一个很重要的博物馆学理论思考的历程。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文物博物馆界的状况是什么样的?其一,文博人希望发展博物馆事业的呼声比较急切。这是思想的呼唤。其二,文博界需要在新旧交替转换的情况下,吸收新生力量。这是人才的需求。其三,期望建立中国式的博物馆学。在此背景下,1981年7月国家文物局在承德避暑山庄举办了博物馆学研讨会,会上大家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文物博物馆的发展道路,反思了苏联博物馆学对中国文博界的影响,认识到新中国文物博物馆经过30余年的发展,有了一定的博物馆经验和教训,也有了发展中国博物馆事业的思想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把博物馆的学术思考提到日程上来的确是大家的心声。我的博物馆学理论研究和相关学术实践活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主要是围绕以下四个方面进行。

第一,博物馆学探索和研究。得益于当时的形势,我参与了一系列高规格的博物馆活动,感受到了博物馆学的气场。比如,1980年,作为高校文博教师,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博物馆学会的成立大会;1982年,出席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首届博物馆理论讨论会;1983年,中国加入国际博物馆协会后,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首次出席在伦敦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博物馆协会大会。在博物馆学入门伊始,我就积极参与国内外博物馆学的交流活动,邀请澳大利亚博物馆学专家雷诺兹访问南开大学,邀请日本的中川成夫来南开大学讲授博物馆学。以上高规格的博物馆学活动,不但使我开阔了视野,而且提高了自信心。

第二,博物馆学著述。1981年,我参加了国家文物局举办的博物馆学研讨会,并参与《博物馆学概论》的撰写。我是第一章的执笔人,也是全书的定稿者。1983年,应国家文物局委托,为全国博物馆干部培训班编写了《博物馆学纲要》,作为教材使用。1987年,与文化部文物局彭卿云、黄景略

等合编《新中国文物法规选编》^[10]。1990年,参与《中国博物馆学基础》^[11]的编写工作。1993年,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的“中国博物馆史”“中国博物馆学著作”“博物馆人物”等多项词条。以上实践,提升了我的理论思维水平,促进了我对中国博物馆实际定位和导向的把握。

第三,高校授课并配备教材教辅。我主要讲授大学文博专业的“博物馆学概论”,同时配备辅助教学的教材和参考资料。比如,围绕博物馆学概论的知识体系,我整理了四辑《博物馆学参考资料》^[12],这在当时是稀有的,它涵盖了当时国内外博物馆学的资料,既有理论性的,又有操作性的,因而深受国家文物局的推崇。此外,我整理了《新中国博物馆事业三十年纪事(1949—1979)》《博物馆学书刊资料目录索引》《建国以来文物法令汇编》等材料,这在全国高校博物馆学专业里是走在前头的。这种博物馆学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使我立定了初心,坚定了要从中国实际出发,用中国话语阐述博物馆发展理论,从而树立起构建中国博物馆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信心。同时也促使我撰写了一系列相关文章,编纂了一系列实用的博物馆学资料,开创了大学博物馆学教材的体例。

第四,参与文博界培训。我不仅在学校主讲“博物馆学概论”,组织学生的博物馆实习,主持南开大学历史学系博物馆学专业开设全国文博干部培训班,而且多次参与文博界的培训工作。如从伦敦归来后,先后应邀在国家文物局泰安培训中心、湖南长沙杨开慧故居培训中心、吉林省文化干部学校、安徽大学历史学系文博班讲授博物馆学。后来受聘天津市文化局“名师教室”博物馆学导师,在两年时间里,指导天津博物馆李玫、天津自然博物馆赵晨、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王青、平津战役纪念馆沈岩4名业务骨干研修博物馆学。

以上就是我对自己主持或参与的博物馆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的一个小结。我觉得,作为追求教科书式的博物馆学的一分子,创新性、开拓性应该是中国博物馆学人的一个品格,一个立场,一个追求。

□ 2008年，您邀请了中国博物馆学界的多位学者，就中国博物馆学的发展问题进行讨论。十四年后的今天，您觉得当时讨论中的哪些关注点得到了重视与发展，而在今后，哪些问题还需要给予持续的关注？

中国博物馆学走向成熟是十分必要的，2008年我邀请多位学者就中国博物馆学的发展问题进行讨论的动机和出发点即在于此。我向当时活跃于博物馆学界的苏东海、甄朔南、杨志刚、史吉祥、宋向光、严建强、安来顺等学者发出了邀请信。他们绝大部分人热烈响应，给我回复了热情洋溢的信，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从现在来看，当时关注的一些重点问题，有些我觉得有了新的变化，而有些变化则不大。从这十四年来学科发展的总体状况看，已经到了更新期，但目前中国博物馆学的学科建设在体系上没有大的突破，像苏东海先生提出的“迟滞论”，没有根本的改观。苏东海先生说博物馆学学科理论化，从现在来看这个变化也不是太大。甄朔南先生提出了新博物馆学的多元思维和包容，这个愿景也没有完全实现。安来顺先生主张要区分博物馆研究和博物馆学研究这两个概念，虽然有所改观，但是变化不大。史吉祥先生认为博物馆学研究的四个基本状况没有大的改观。严建强先生认为当前中国博物馆学研究缺乏前瞻性。大家虽然有共识，但是对前瞻性的探讨，特别是从中国的博物馆实际出发，怎么建立前瞻性意识的讨论还不多，也不够清晰。以上是我从博物馆学发展现状出发，对2008年笔谈所讨论问题的认识。

当年，这些学者都是站在时代之变和社会文化本质需求来思考博物馆学的发展情况，都是以积极的态度评价博物馆学整体面貌，他们对当时国内博物馆学发展问题的指向总体来说，是符合实际状况的。但今天看来，就理论、预设、方法论、基本概念与范畴、话语、方式等而言，的确未有大的突破。中国史学史的奠基者、开创者，北京师范大学的白寿彝先生，曾经对中国史学史的学术状况说过一句概括性很强的话：中国史学史在路上。相应地，中国博物馆学恐怕也仍处在最初形成的路上。

实事求是地讲，中国博物馆学在2008年以后还是有变化的，大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博物馆学的思考有了新的发展。涌现出不少论著，包括成册的著作，包括经典的学术论文，包括对外国博物馆学著作的译介等。总之，是在博物馆学的思考上有了深化的进展，学术自省意识明显加强。这一点是可喜的。第二，博物馆学的分支学科不断出现，像博物馆学史，纳入了国家课题的层面，这也是博物馆学发展的一个标志。第三，一些博物馆实践进展很快，成绩卓著，如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体现了博物馆学的时代理念。第四，国外博物馆学的前沿学术更加畅达地介绍到国内，不仅是介绍到国内来，而且很快本土化。第五，一批致力于博物馆学研究的新锐逐渐崭露头角。就以上五个方面的变化而言，我们不能说国内博物馆学仍然像十四年前博物馆学者的评价那样停滞不前。像苏东海先生所提出的“迟滞论”不是一种终极的结论，只能是他对当时国内博物馆学现状的一种忧虑。苏东海并不是中国博物馆学的悲观论者，从他的论著中可以窥见他对中国博物馆学的希望和乐观。

对于今后中国博物馆学应该关注的点，我如是想，未来十到十五年是中国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机遇期，也是博物馆学理论中国化发展比较大的时期。综合各大学科的发展史来看，许多学科都在重大机遇期表现出强劲的发展态势，找到突破口，趁势而为，出现崭新的学术局面。比如，中国的社会学、政治学等都是遇到重大的社会变革，出现了新的需求，促生了新的发展。中国博物馆学也即将迎来千载难逢的机遇期。所以在未来博物馆学学科研究深入、细化和推动学科交叉、跨越等革新的趋势下，有远见的博物馆学者应该有新的觉醒、新的预测，应该感受到这种学术趋势，做好理论预设，蓄势待发。

从2008年我主持的这次博物馆学学科讨论到现在已经过了十四年，我觉得应当有一次对于十四年来博物馆学发展和博物馆学研究的回顾、检阅，并对未来博物馆学走向做一个前瞻。我个人希望能够

组织一次中国博物馆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博物馆学研究的讨论。在这样一个恰当的时机、关口，能够动员中国博物馆学界的朋友们，关心博物馆学发展的机遇期是非常有必要的。

中国博物馆学的发展还是存在一些瓶颈问题的，大概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博物馆学科的顶层设计薄弱，缺乏学科发展的中远期规划。第二，教育部与国家文物局未能形成对博物馆学的共识和合力。第三，博物馆领域高层次人才和基础研究人才不能满足博物馆发展的需求，特别是未来博物馆学领军人才的短缺日益突出，要从服务国家战略的人才培养体系出发，高度重视博物馆拔尖人才的培养。第四，博物馆学研究者们在结构上比较松散，没有形成合力和向心力。研究状态还是碎片化的，缺乏像其他学科和学术增长点那样的协同创新中心。协同创新中心是当前一些学科新的学术组织形式，它把一批具有学科共识的著名专家联合起来构成一个新的学术团体，在共同的目标和学术共识下合作发展。第五，在理论、预设、方法论、基本概念与范畴、话语、方式等方面对西方有较大的依赖，甚至不可或缺。2008年学科笔谈时，史吉祥先生曾经特别提到这一问题，今天来看，虽有改观，但这种依赖性仍比较强烈。

陈国宁女士曾向我提过两个问题：中国的博物馆文化应有什么走向？我们还要跟随欧美国家博物馆的脚步吗？这两个问题涵盖了对中国博物馆学现状和走向的关心和疑问，涉及中国博物馆学与西方博物馆学的关系，是根本性的问题。我把它们称作“陈国宁之问”，需要持续关注。

四、未来展望

▣ 近年来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较快，尤其在场馆建设、陈列展览、社会服务等方面都有不少的进步，但是博物馆的文化竞争力依然不足，而且在文化竞争中，博物馆文化的个性特征逐渐模糊。您认为博物馆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它不可取代的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应该如何增强博物馆的文化竞争力？

博物馆存在的意义，应该从博物馆的本质特征来谈。换个顺序而言，博物馆具有不可替代的本质特征，因此博物馆有存在的意义。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博物馆、纪念馆和文化考古基地进行考察。他曾经强调，中国各类博物馆不仅是中国历史的保存者和记录者，也是当代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博物馆的重要性、历史性、现实性的重要论述厘清了博物馆存在的价值。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对博物馆存在的意义给予了十分明确、肯定的回答。博物馆肩负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是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平台和窗口。这种意义和重要性是不可取代的。

博物馆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呢？博物馆本质上是以物为特征的，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现当代社会主义特色文化，从而凝聚共识，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推进社会发展的文化机构。这是我对博物馆的定义，也可以说是博物馆的特征。这种物具备历史真实和稀有的双重性，而这种双重性首先表现在它的历史真实性、典型性、代表性，因此我们把这样的物请到博物馆来永久保藏，并把它作为一种化身和替代，激发它的活力，揭示它的内涵并展现给公众，进行宣传、教育，让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从这种对物的阐释中受到教育。这种物传达人类物质文明的演变史、人类智慧的养育史、人类审美的发展史等。这种物载信息具有很强的思想智慧的表达功能。由此可见，博物馆物的特征是不可替代的。博物馆物就是博物馆存在的基础，也是博物馆存在的意义。

应该如何增强博物馆文化的竞争力？我很认可陈国宁女士的观点。她说，中国博物馆的营运应更加生活化与多元化，去传导历史教育的启示、审美观、道德观、人生观，而不仅仅是现在的橱窗、古文化展示，且应透过文学、语言、音乐、戏曲、艺术、演绎等资源的运用，去感动人心。

博物馆文化竞争力是极具知识考古学意义的，在学术研究上的张力十足，有深度、有广度、有锐

度和理论意义，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围绕高质量发展的总体目标，坚持以观众为中心、以服务文化繁荣为中心，将博物馆打造成实物文献资源中心、观众学习中心、科学服务中心、文化展示与交流中心。博物馆文化竞争力可以考虑从这几方面来加强。第一，将馆藏文物的科学价值和教育价值摆在文化竞争力之首。这一点，博物馆的任何工作营运都不容忽视，不能离开物的本质。第二，展现陈列的美学力。策展人应该立足于博物馆的具体情况，深刻把握博物馆所在的文化领域的特征，领会公众特别是观众文化需求和文化心理，来构成一种新的美学力。第三，注重特定时代品牌形象。第四，提升文化传播力。要把博物馆的宣传、教育的活化策略转变成文化的传播力。第五，扩大国际影响力。不断加强博物馆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建设。第六，加强博物馆自身建设，积极推进管理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

现在国外一些博物馆人提出一种探索现代人的趣味主义，我觉得这个提法应该引起国内博物馆学者及工作者的重视。怎么能够把博物馆所具有的这种特殊的、典型的物的本质、内涵激活，形成现代人所追求的、所应有的一种趣味，就像陈国宁女士所说的激发一种生活化的吸引力，这个非常重要。要采取一切有力的措施提高对博物馆学的全面理解和认识，提升观众的参与感，拉近博物馆跟普通市民的距离，打造文化课堂，特别是打造一个能够吸引青少年的文化课堂。

□ 您在致力于中国博物馆学研究的同时，一直关注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它们的发展经验对我们有何启发？

我曾经跟日本博物馆学界的朋友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有过比较多的联系，在日本博物馆协会和日本立教大学等的博物馆刊物上分别发表过论文，也曾访问过日本，但是对日本博物馆的比较全面的、系统化的研究不够。对于台湾地区的博物馆，我也仅是从几个博物馆学者的著述入手了解其现状的。

日本的博物馆，需要分不同的时间段来讨论。日本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博物馆的展陈手段、博物馆的展陈材质及材料的运用和创新都有一个过程。不同地区博物馆的生存、发展的状况也有差异。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博物馆的整体运营情况比咱们好，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博物馆的观念、博物馆学的理念比较深入地渗透到了博物馆工作者的思想和所从事的活动中，自觉性更高。第二，博物馆文化在社会大众中的养成程度较高，对博物馆文化的喜爱、追求比较社会化，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第三，日本的博物馆运行与管理更规范，有关法律法规较为成熟。这点值得我们学习。

台湾地区的博物馆，从规模、影响、现代化程度等方面看，应该说都不如大陆，但是它有两个特点比较鲜明。第一，台湾地区的博物馆比较强调地域性文化，就是在博物馆所在地能够形成一种文化的凝聚力，能够从当地民众的需求出发，结合当地的风俗、民情、传统文化基因，来展示博物馆的内涵，来吸引当地观众。特别是在陈列手段上非常重视观众的参与性，能够把观众的参观兴趣、对博物馆文化的追求纳入博物馆的陈列和其他的工作中，使观众从旁观者变成主动参与者，激发他们内在的文化兴趣。第二，台湾地区的博物馆人比较重视发掘和利用本地的文化资源。在强调本博物馆或者纪念馆文物藏品价值的同时，他们会想方设法地与当地的文化资源结合起来。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是筹划临时性展览；一是把当地的文化资源纳入博物馆陈列中，并扩散、发散到其他博物馆工作，如宣传教育手段、纪念品设计等，都体现出当地文化资源的特征。他们特别强调要吸引本地居民和外地游客，使博物馆成为一个扎根本地、吸引外地观众的场所，将所能从事的技艺都吸纳到博物馆的工作中来。这一点比较突出，所以台湾地区的博物馆在当地都很有亲和力、吸引力。

□ 作为中国博物馆学发展的亲历者和观察研究者，您对中国博物馆学的未来发展有何期许与建议？

这个问题是一个时代的议题，对我这样一个博物馆学的过去的参与者、现在的爱好者来说，是一个大考题。前面已经谈到，我有一个强烈的、鲜明的断言——未来十到十五年将是中国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机遇期，也将是中国博物馆理论中国化发展的机遇期。这样一个判断是有着理论和社会依据的。

党的十九大做出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历史性论断。高质量发展已从经济领域延伸到教育、文化、社会各个层面。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等九个部门印发《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通知，从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中国博物馆的未来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国民经济、社会大发展，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需求日益高涨，对高质量发展的博物馆需求也极为强烈。这是中国博物馆即将迎来高质量发展的社会依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同样，中国博物馆事业也得到高速发展，新的博物馆纷纷建立，博物馆观众持续增加，博物馆规章制度不断出台，博物馆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为博物馆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是中国博物馆即将迎来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依据。

因此，我认为未来十到十五年是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机遇期。在这一现实情况下，社会必然会对中国的博物馆学提出新的要求和期盼。中国博物馆界，尤其是博物馆学界必须要做好准备，有四个问题不可绕开，不可不回答。

第一，如何持续推进我国博物馆的高质量发展。既然国家已经明确提出了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那么从理论架构上如何继续推进这样一种高质量发展，应该做出学术性的回答。

第二，博物馆高质量发展如何融入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满足社会对高品质博物馆的需求，并成为其中的一支力量。这个问题需要研究，也是博物馆学不可回避的一个时代议题。

第三，如何实现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等九个部门提出的实施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创建计划。这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宏大、非常深刻的时代课题。它有两个最重要的内涵，第一是中国特色，第二要世界一流。这个计划如何实施，从理论的高度应该做出什么样的构想、理论预设，都是先要解决的问题。

第四，如何加快构建现代化博物馆治理体系。如果我们全面地、彻底地、快速地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博物馆今后的一个发展目标的话，那么现在需从博物馆内部机制、博物馆事业体系等方面提出新的变革要求。

如果这四个新时代中国博物馆高质量发展问题得到解决，进而形成了一套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体系、政绩考核体系等理论方案，就一定会促进博物馆理论和实践的显著发展，就一定能够增强中国博物馆界在世界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总体来说，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背景出发，秉持文化自信的信念，面向中国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实际，以宏观的视野、多样的视角、科学的反思，坚持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加强理论思考，注重前沿性、集团性研究，专博结合，我们就一定能突破博物馆学发展的瓶颈。

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博物馆文化交会点上，构建中国特色的博物馆体系，巩固、提升中国博物馆学的学术地位，这就是我对未来中国博物馆学发展的期盼和希望。

附 梁吉生博物馆学代表性著述

- ① 梁吉生:《旧中国博物馆历史述略》,《中国博物馆》1986年第2期。
- ② 梁吉生:《论旧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历史意义》,《中国博物馆》1988年第2期。
- ③ 梁吉生:《博物馆的文化选择》,《中国博物馆》2007年第2期。
- ④ 梁吉生:《21世纪:博物馆学和博物馆学教育的沉思》,《中国博物馆》2001年第3期。
- ⑤ 梁吉生:《中国近代博物馆事业纪年》,《中国博物馆》1991年第2期。
- ⑥ 梁吉生:《90年代博物馆发展刍议》,《中国博物馆》1992年第3期。
- ⑦ 梁吉生:《近代中国第一座国立博物馆——国立历史博物馆》,《中国文化遗产》2005年第4期。
- ⑧ 梁吉生:《中国近代博物馆事业的里程碑——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东南文化》1991年增刊。
- ⑨ 梁吉生:《博物馆学本土化发展及其今后路向》,《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06年第1期。
- ⑩ 梁吉生:《中国博物馆藏品保管》,《中国文化遗产》2005年第4期。
- ⑪ 梁吉生:《博物馆学教育刍议》,《中国博物馆》1985年第2期。
- ⑫ 梁吉生:《博物馆观念与社会效益》,《文博》1987年第3期。
- ⑬ 梁吉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博物馆改革》,《中国博物馆》1993年第2期。
- ⑭ 梁吉生:《博物馆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中国博物馆》1986年第3期。
- ⑮ 梁吉生:《中川成夫论日本的博物馆与博物馆学》,《中国博物馆》1986年第1期。
- ⑯ 梁吉生:《博物馆学重建十年的回顾与断想》,《中国博物馆》1989年第4期。
- ⑰ 梁吉生:《博物馆学十年概观》,《文博》1989年第6期。
- ⑱ 梁吉生:《强化“学科意识”,拓展博物馆史研究新路径》,《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七辑),岳麓书社,2011年。
- ⑲ 梁吉生:《中国博物馆的骄傲——关于张謇及其博物苑的随想》,《回顾与展望:中国博物馆发展百年——2005年中国博物馆学会学术讨论会文集》,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
- ⑳ 梁吉生:《中国人眼里的外国早期博物馆》,《大自然》1982年第2期。
- ㉑ 梁吉生:《博物馆三题》,《文博》1991年第4期。
- ㉒ 梁吉生:《十年来的博物馆学及其今后路向——祝贺中国博物馆学会成立10周年》,《北方文物》1992年第2期。
- ㉓ 梁吉生:《深化改革、提高博物馆整体水平》,《文博》1992年第3期。
- ㉔ 梁吉生:《加强对博物馆现实问题的研究》,《中国博物馆》1987年第2期。
- ㉕ 梁吉生:《一部台湾博物馆学新著的评价》,《中国博物馆》1987年第3期。

参考文献

- [1] 费畊雨,费鸿年.博物馆学概论[M].上海:中华书局,1936.
- [2] 傅振伦.博物馆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 [3] 徐玲.中国博物馆学学科发展的回顾与反思[J].东南文化,2014(5):101-109.
- [4] 宋伯胤.博物馆人从语:宋伯胤博物馆学论著选[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
- [5] 吕济民.中国博物馆史论[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
- [6] 苏东海.博物馆演变史纲[J].中国博物馆,1988(1):10-23.
- [7] 陈建明.中国博物馆学历史文献选编[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
- [8]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文物博物馆》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M].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 [9] 梁吉生.中国博物馆的骄傲——关于张謇及其博物苑的随想[C]//南通博物苑.南通博物苑百年苑庆纪念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36-42.
- [10] 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新中国文物法规选编[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 [11] 王宏钧.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修订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12] 文化部文物局教育处,南开大学历史系.博物馆学参考资料[M].1986.